

普實克論魯迅與葉紹鈞

黃仲鳴

讀普實克《抒情與史詩：現代中國文學論集》(李歐梵編、郭建玲譯、上海三聯書店，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得益殊多。此書列為「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書」之一。最吸引我與中國現代文學的，是書中兩篇文章：魯迅的《懷舊》與葉紹鈞的《懷舊》。《懷舊》寫於一九一一年冬，即五四運動爆發前八年，以文言寫就。普實克指出，我們閱讀這篇小說的時候，會明顯地感受到，它完全是一部現代作品，而不屬於新文學之前那個時代。普實克所列舉的理由是：

「魯迅對情節所做的是一種簡化處理，把情節化約到最簡單的成份，試圖拋棄說明性的故事框架來呈現主題。魯迅希望不借助情節的踏腳石，直接抵達主題的核心。」

普實克說，這與傳統小說注重情節結構不同，魯迅只是以古文的創作開闢了新的方向。我常想，以那種語言來創作，無論是文言文、白話文、方言都可，重要的是作品本身的表現手法、價值和意義。當然，所用語言的好壞也是決定成功的因素。

普實克將《懷舊》定論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先聲」，目光之遠，論證之謹嚴，實非「胡說」之作。

《懷舊》是魯迅第一篇小說。葉紹鈞保留下來的最早一部短篇小說《窮愁》，也是以文言寫成，創作於一九一四年，比《懷舊》遲了三年。普實克將葉紹鈞與安東、契訶夫來作比較，但文中，不少篇幅涉及魯迅。

普實克說，葉紹鈞「與魯迅一樣，都懷着同樣的目標，希望寫出中國新文學特徵鮮明的第一批作品」，無獨有偶，在新文學爆發前，他倆都「熱衷」於文言寫作；「與舊的文言文」有「密切聯繫」。其後，葉紹鈞很多作品，都與舊小說有「聯繫」。而在情節的發展中，和魯迅都有「驚人的相似」；同樣，葉紹鈞在情節的安排上，都「變得無足輕重，只有感傷情緒的抒寫」。

進一步，普實克將他倆比較一番：

「葉紹鈞在表現手法上的新異之處在於，他加任何的描寫和評論，就可以使我們像小說中的其他角色那樣，通過婦人的對話直接認識裡面的人物。魯迅也使用過同樣的方法，但他的目的更明確，或是記錄農村普遍的生活狀況，或是塑造各類人物形象，尤其是那些被命運壓榨的犧牲品，或是揭示那些明顯異於常人的內心世界和人際關係。」

葉紹鈞寫於一九一三年的《孤獨》，普實克也推崇備至：

「小說意味深遠地成功表現了中國絕大多數人灰暗、絕望的生活，即使魯迅也稍遜一籌。」

普實克認為葉紹鈞是中國「第一流的新文學作家之一」。可惜，在內地所出版的現代文學史，葉紹鈞排不上高位，與排行第一的魯迅，何止是「稍遜一籌」，普實克真是青睞有加，但對此評價，我仍有所保留，待商。

普實克此書，獨具慧眼。作者提供圖片

劉起鈞們為什麼活得沒有尊嚴？

——從三位學者不同的晚年境遇談起

說來慚愧，我雖然喜歡在閒暇時間閱讀《尚書》之類的古書，但此前並不知道有個叫劉起鈞的老學者。近幾天，看了《金陵晚報》2月13日刊登的文章《SOS：著名先秦史學家劉起鈞先生晚年淒涼》，心中也湧起了不小的波瀾。讓我最為震驚的不是他窮苦無依的悲涼，而是他乞求幫助時的卑微姿態。讀這篇報道之際，一個疑問困擾着我：劉起鈞為什麼活得沒有尊嚴？

劉起鈞1917年生於湖南安化，是著名史學家顧頡剛的弟子，專攻上古史，尤以研究《尚書》聞名。他1976年3月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曾任國務院古籍整理領導小組成員。2004年回到南京投奔子女，不料卻不得不寄身托老所，陷入窮苦且孤獨無

依的境地。今年已經95歲的著名學者竟然淪落到無家可歸的地步，讓許多人不可勝唏噓。

或許是因為最近在讀一本名叫《海德格爾的小屋》的書，劉起鈞的處境首先讓我想到了曠世大哲海德格爾。這位以學術聞名的天才也熟諳棲居的藝術，善於設計不同功能的住所。在退休後，已經擁有兩套住房的他又在臨街的地方為自己建造了晚年住宅。待80大壽一過，他就悄然搬到新居。這套房子不如他在黑森林的小屋那樣親近自然，也沒有他的郊區住宅寬大，但生活便利，更適合度過退休後的時光。有了好的棲居地，他生命中的最後幾年過得很幸福。在閱讀有關劉起鈞晚年境況的文章時，我不由得想：假如他也能像海德格爾那樣善於安排自己的退休生涯，結果可能完全不同。當然，這僅僅是設想而已。我不知道海德格爾任教時的薪水是多少，但可以肯定兩點：其一，他的收入可以使他建造多個住宅；其二，德國的法律允許私人買地建房。相比之下，劉起鈞老先生的工資僅有區區1900元，既買不起現在的商品房，又無權自己蓋房，當然不可能像海德格爾那樣「詩意地棲居」。2004年回南京後，他又賣掉了原有的住宅（估計是單位分配的福利房），失去了自己受法律保護的私人空間，最終只能寄住在親人家裡或「托老所」中。在此期間，他始終處於依賴「親人」和「組織」的狀態，其幸與不幸都不能由自己決定。倘若「親人」和「組織」的支撐系統出了問題，他

就會不可避免地陷入窘境。這種被動品格至少間接地造就了其晚年悲劇，使他不能有尊嚴地活着。

在網上查了劉起鈞先生的許多資料，知道他是個倔強、耿直、天真的老派學者，研究的足艱深的學問，不善於經營生活。即使在學界，他也不算「成功者」——退休時僅為副研究員的他甚至沒有自己的辦公場所，長期在顧頡剛的家中上班。這類人物往往既不能在政界長袖善舞，也無法到商海中搏擊風浪，只能老老實實地依賴自己所隸屬的社會網絡。其實，依賴某些結構並非僅僅是中國學者的命運——人生在世，總要依賴更大的群體。2002年，在美國進行學術訪問時，我結識了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的代表性人物科布，發現他「依賴」福利制度的退休生活也過得多姿多彩。年逾70的他將自己的豪宅捐給了公益組織，自己則搬到專供退休者居住的普通社區。靠退休金和政府福利生活的他依舊擁有獨立房屋，不但衣食無憂，而且能享受比較豐富的社區文化活動。拜訪他的那天恰好是社區居民聚餐的日子，他邀請我一起參加了社區午餐。在寬敞的社區食堂裡，我認識了許多情緒高昂的老人，與他們談論了旅遊、布什政府、交通、家庭倫理在內的許多話題。有趣的是，這些生活幸福的老人喜歡批評政府，總覺得當局做得還不夠好。每當談到相關話題，他們總是慷慨激昂地發言。在閱讀有關劉起鈞先生的資料時，那些興奮的面孔時常浮現在我的眼前：假如中國也有類似的保障體系，晚年的劉起鈞先生就不必求乞他人的幫助，完全可以活得更好。

與海德格爾和科布相比，劉起鈞先生既沒有足夠的經濟收入，也缺乏可以放心依賴的福利體系。隨着親

又給老外騙？

翠袖乾坤 伍淑賢

西九文化區行政總裁謝卓飛，以心理健康理由極速辭職，回英後旋即獲聘為英國文化協會全球藝術總監，引起關注。我們不是不給外人騙了？本來騙人與被騙，只關乎閱心術之高下，與國籍無關，但他是洋人，更是前度宗主國的洋人，大大刺激了港人潛意識裡「又被鬼佬騙了」的原始反應。

事後至此，「劇情」已很清楚：估計計男主角來港履新後，發覺政治環境十分複雜，根本不是他那一杯茶；又或者形勢禁錮，如繼續在位上，必須作出一些他不願意的決定，借病遁是上策，而拿張醫生證明，更是易過借火。至於英國文化協會和謝卓飛之間，誰向誰先送秋波，已不重要。

不過最令港人意外難平的，是英國文化協會宣佈任命謝卓飛的新聞稿裡，竟理直氣壯提到他曾經出任西九文化區行政總裁！雖然說的是事實，但一份只當了五個月的工，最後還要借病遁，卻不避嫌地大肆張揚這段履歷，品味真夠低；而借香港一升呢過「橋」的用心，不論有意無意，都很難洗脫。

港人受老外「欺負」，無日無之，而且甘之如飴。簡單如樓盤廣告，也充滿另類的「欺凌」信息。隨便打開報紙，那些甚麼山、甚麼巒的超豪華樓花，畫面盡是洋男洋女，巴黎倫敦紐約、法國南樓、意大利風情，你幾時見過有華人模特兒在高價樓盤廣告出現？對行內人，這早已不用多說了，總之市場愛崇洋，你就讓它崇個飽，甚至樓盤中文名也久奉，有英文名字就夠，法文更好。比如西九的豪宅凱旋門，本來就以法文原文上陣，後來連賣樓的人也

海盜還是海軍？

海闊天空 蘇狄嘉

「你是海盜還是海軍？」朋友問我。

人大致可以分為兩類：海盜型的人，是冒險者、野心家、叛徒。海軍型的人，一般都是服從、守法、易受組織和控制，他們生活得很有秩序。如果你是海軍，你會尋求許可，海盜則只會請求寬恕。

這個海盜/海軍的概念從何而來？這是一家廣告公司為了激勵員工開發創意而設的口號：「記住，海盜比海軍更有趣。」它鼓勵員工們做不同的事情，打破規則。

記憶中，一九九七年蘋果電腦有一個廣告文稿，體現了「海盜型」的人的素質。它大致說：「他們是瘋狂的、叛逆的、製造麻煩的……他們看事物與眾不同，他們不喜歡規則，他們亦不會尊重現狀。你可以引述他們，反對他們，美化或毀壞他們，但千萬不能做的是忽視他們。因為他們將會改變這個世界，推動人類前進。有人可能認為他們是瘋狂的，但我們看到的是天才！」因為只有如他們般瘋狂，才能改變這個世界！

這不是一說「海軍型」的人不好。有趣的是，這世界同時需要「海盜型」和「海軍型」兩種人才能順運轉。年輕時你可以曾經是一個海盜，但大多數人長大後會轉當海軍。試想，海盜有一套房子要供、幾個孩子要養，可能嗎？搞不好可能在某個時候會被逮捕。但偶爾你可以發呆，回想從前的日子偷笑：不等等候交通燈過馬路、闖紅燈、車停在禁止停車區、偷買小童車票或根本沒買車票乘車、假裝中暑擲去廁所……



劉起鈞先生晚年淒涼。網上圖片

人的相繼生病，他只能寄希望於「上面」的關懷。前幾年，他不斷寫信求救，就是想將自己從眾生中凸顯出來，獲得「有力之長者」的注意和關照。支持他的記者、學生、同事強調他是「泰斗」、「20世紀最後一位史學大師」、「宗師」，表達的是同樣的意向。凸顯自己的特殊性，是中國知識分子普遍採用的生存策略。它既敞開了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被動狀態，又暴露了其殘存的等級意識和特權思想。這種精神欠缺使他們難以從制度層面考量自己和他人的處境，所期待的僅僅是個案性的特殊關照而非普度眾生的制度安排。事實上，對晚年的劉起鈞先生來說，非制度性關懷已經降臨過多次，他也曾多次「老淚盈眶」地表示感謝，可他恰恰在斷斷續續的關懷中陷入了淒涼的晚景。顯然，在面對劉起鈞先生的困境時，單純強調他們作為個體的特殊性並無實質意義。即使劉起鈞先生的學術價值因媒體的報道獲得了承認，即使來自上面的特殊關照改變了他最後的生存軌跡，其他的「劉起鈞」們依然會陷入類似的困境中，暴露出同樣的卑微品級。不將他還原為普通的公民和長者，我們就無法發現當下社會普遍存在的問題，設計出一套好的制度體系，讓所有的「劉起鈞」們都像海德格爾和科布那樣有尊嚴地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



海德格爾晚年過得很幸福。網上圖片

「登高望遠」

思旋

國家領導人在每年「兩會」期間，分別到各小組與代表和委員共商國是，既細心聆聽重要代表或委員發言，更會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三月四日下午，一如去年，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親到北京飯店與港澳聯席小組座談。首先由陳永棋發言，港區委員李安強、梁傑浩、施祥鵬、莊紹斌、胡葆琳、李家發、黃吉雲、陳振東、胡葆琳等，他們就各自熟悉的範疇圍繞主題講出心声。講者發言內容質素優劣，他們的普通話水平也大有提高。陪同習近平副主席出席座談會的還有全國政協副主席廖正興和董建華、何厚錕等。領導人認真地聽邊邊筆記。

兩個多鐘頭的座談會重頭戲當然是主角習近平的講話，他不但在國家副主席，重要的是他是港澳小組的負責人，對港澳事務十分熟悉。大家包括港澳市民都希望聽到習近平的講話。國家副主席對港澳新政策的要點和指導思想。習副主席去年向港澳委員提出五點要求：今年他的要求有三點。他要求大家支持兩個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正確理解「一國兩制」和基本法。

習副主席指出內地與港澳優勢互補。在「十二五」規劃期內，將與國家前途更緊密聯繫在一起，我們要廣泛團結各界人士，秉持對國家、對民族的責任，要「登高望遠」，為祖國繁榮和港澳發展積極建言獻策。他又提到香港特區政府提出的六大優勢產業，及應對輸入性通脹，鞏固香港金融、貿易和物流等中心的設置，中央十分支持，亦鼓勵委員積極建言獻策和作出貢獻。

我感覺到今年兩會除「十二五」規劃為主題外，對青少年國民教育尤為重視。習副主席提出第三個要求就是「薪火相傳，加強關心港澳地區青少年健康成長，關心青少年」所思、所想、所盼一和成長中的煩惱，以民為本去關心

不探望父母犯法

生活語錄 吳康民

內地有一個新修訂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草案，準備提交審議通過)。其中在「精神慰藉」章中規定：「家庭成員不得在精神上忽視、孤立老年人。」並且特別強調：「與老年人分開居住的贍養人，要經常看望或問候老人。」

如果經常看望和問候列入法律規定，子女不經常回家探望父母，便是犯法。

不經常回家探望父母，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況。有一種是身不由己，兒女們為生計奔波，生活並不輕鬆，每有假期要千里迢迢回鄉探親，又因運輸工具一票難求，要回老家不易，別說能「經常看望」了。

但卻有更多的十分自私，只顧和自己的妻兒逍遙快活，雖近在咫尺，也不經常回家探望。或者只是在對父母有所求的時候，「向錢看」流行，一切看金錢關係，能從父母

自由的創作課

詩幻留形 陳智德

為成年學生而設的創作課，氣氛應該更自由，也更針對個別學生各自不同的文藝品性(而不是「需要」)。

一般人的理解，是成年人都功利、實際，而青少年則追求理想，不追求功利；這當然是一般實情，不過在教育的情況未必如此。由於教育制度的改變，許多時候，青少年學生即一般體制下的學生，他們的確是有自己追求的目標和一定的個人信念，但對待體制教育課堂而言，其要求和心思卻很功利、實際，事實上教育提供者以至推銷者，在本身和學生教育意義上，已不太視為一名具傳統教育意義的老師。

成年學生即在職學生，除非他們上課的原因是出於被迫，一般對課堂的要求有別於青少年學生的功利、實際。在這種情形下的文學創作課，談論的是真正的文學。寫了多篇談創作課的文章，才逐漸記得其實真的不用在意，只是自己有時也忘記了；真的毋須在意去談這些事，要談的話，一兩句也就夠了。

無論如何，創作課對教師或學生而言，都應該是自由、開放的空間，目的也應該很純粹，就是因為喜歡寫作。創作課的形式應該如何？應該設計什麼活動？要帶出什麼學習主題？應該如何評分？怎樣的習作才是好習作？應採用哪些和多少的「範文」等等問題，都不妨由教師和學生自行構思，既然創作課的目的是文學，那麼文學的模樣如何，創作課就可以如何；而文學，正是自由和純粹的。誰都知道，沒有人談自由的，教師和學生當然也是不自由，不多談是避免人們知道自己是原不自由，徒生無從改變的感覺。